

内容提要

作为一本国内的五四研究文集，本书在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用浸透着批判精神和现实感的笔触，对五四启蒙及中国近现代文化作了深刻的探讨，开创了五四研究的新格局。

五四与现代中国

——五四新论

五四与

现代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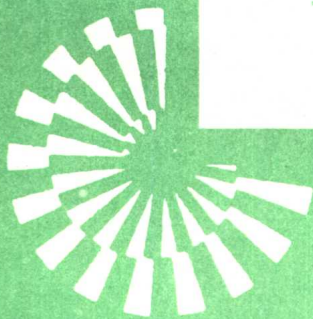
丛书



五四与现代中国

——五四新论

编者 丁晓强 徐 梓



山西人民出版社

五四与现代中国

丁晓强 徐 梓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198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册

ISBN 7—203—00962—6

K·46 定价：3.40元

《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

总 序

发生于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它不仅凝聚着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风云，而且牵动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神经。七十年岁月流逝，五四早已时过境迁，但五四所揭示的历史主题——传统与变革，迄今仍是迈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苦心求索的时代主题。时下现代化变革所引发的文反思，骤然缩短了五四与现代中国的时距，而使五四的历史和文化意蕴日渐凸显出来，在历史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传统仍是历史向前迈进的沉重包袱，民主和科学仍是我们时代的启蒙主题。这一切不无悲剧意味地告诉我们，无论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我们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从现代化意义上讲，我们仍与七十年前的五四同处一个时代。五四孕育了文化巨变的时代，但由于其历史文化环境的严峻和变革主体思想的局限，终使其难以完成这一文化嬗变。五四的变革精神，透露出中国文化再生的无限生机；而五四的变革极限，又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步履维艰。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变革还须从重新认识五四开始。这种重新认识，既是对五四启蒙事业的继承，又是对

FOO1 / 01

五四时代局限的超越。只有在继承和超越五四的基础上，中国文化才能实现重建和复兴。因而，在伟大的启蒙时代逝去大半个世纪而中国步入变革与复兴历史关头的今天，反省和重估五四的文化价值，就显然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术，而是一个极富时代感的理论课题。

有感于斯，值此“五四”七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编就了这套《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丛书的宗旨不在于简单地凭吊历史，而如其名所示，在于以现代中国的宏阔历史视野重新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省察五四的历史文化意蕴，而寻觅中国文化转形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途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对繁荣五四和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问题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而且能对广大关心民族命运和文化前途的读者有所裨益。

《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编委会

1989年1月于北京

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

编委会

顾问/ 彭 明 丁守和 姜义华
龚书铎

主编/ 张静如

编委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晓强	王 跃	王京生
毛 丹	许之微	吴景平
吴根梁	郑大华	胡长水
胡正豪	高力克	萧延中

目 录

姜义华	论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拮据 与对流.....	(1)
谢选骏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 个基本线索.....	(17)
高力克	五四启蒙与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世界观 透视.....	(44)
张静如	忙中出错——说五四精神之弊.....	(54)
王富仁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	(62)
包遵信	未完成的“涅槃”——对“五四”的反思	(101)
黄克剑	“五四”文化价值取向论略.....	(130)
卢敦基	激进与温和——关于两种文化态度的断想	(151)
彭 明	论五四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166)
胡长水	跋涉在乌托邦的荒原.....	(182)
黄知正	五四科学思潮的双重轨迹.....	(204)
萧延中	“自我”与社会：五四时期毛泽东的人学观	(227)
尤文科	胡适与“整理国故”.....	(256)
郑大华	梁漱溟与五四东西文化之争.....	(274)
编后记		(291)

论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

在现代中国的拮抗与对流

姜 义 华

姜义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近年来撰写有《章太炎思想研究》（该书获得了吴玉章奖金），主编有《中国革命史教程》等。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整个近代启蒙运动，近些年来出现了截然相反两种评价。一种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全面地反传统，倡导全盘西化，后来是全盘苏化，导致中国文化的断裂，最终引发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另一种评价认为，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实际上中途夭折了，正因为它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相反，为传统所压倒，方才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历史的悲剧。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为什么没有完成它们所负的历史使命？论者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以为救亡与爱国压倒了启蒙，或以为启蒙自身脆弱而不成熟，莫衷一是。本文不打算对这些见解——加以述评，只准备从人们尚未加以注意的一个方面，即从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拮抗与对流，来观察一下启蒙

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以就正于方家。

——

长时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近代以来中国的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或整个近代化现代化运动看成同一性质的运动，先前同属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后同属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后同属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认识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因为农民运动中有相当一部分确实同启蒙运动及整个近代化现代化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后者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但是，毋庸讳言，这一认识也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因为客观的历史实际远比这一认识所概括的情况要复杂。系统地考察一下两千多年来中国小农社会周期性的运动与农民暴动、农民战争的历史，综合考察一下近代以来农民运动的基本要求、运行的主要趋向以及实际结果，就不难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农民运动的主体部分，其实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农民运动的再版，它们同启蒙运动或整个近代化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同的运动方向、运动目标、运动形式、运动方法，简言之，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质。

近代化现代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社会化的大生产取代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以商品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以由法治所保障的人们的自由与独立关系取代传统的家族宗法关系，相应地，在思想、政治、文化上，以科学取代传统的迷信，以民主取代传统的专制，以开放取代传统的封闭，以世界性的联系取代传统的地域性联系。这一

近代化与现代化运动是由列强强制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触发，继而由中国新兴的社会力量先是用英、俄、日、普模式，其后用美、法模式，按资本主义方式去推进，再用苏联模式，现正用中国努力自创的模式，按社会主义方式在进行。

近代以来的农民运动，从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和“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解归圣库”，居民生活必需品一律由圣库按定额配给，到义和团的烧铁道、毁教堂、拔电竿，扫尽邮政、报房、洋学堂，“除灭鬼子保大清”，再到《龙华会章程》的“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资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以及白狼起义“老白狼，白狼老，平民说我白狼好，二年来二边贫富均匀了”的实践，实际上，都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小农社会矛盾积聚的产物，是土地由分散到集中必须再分散、人口由稀少而缺乏到膨胀而充盈必须再度与土地负担均衡的周期性运动的结果。它们与近代化现代化运动关系很少。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运动从地域上讲，只活跃于东南沿海地区及少数城市，对内地及广大农村的实际影响很有限。农民们没有给卷到近代化现代化浪潮中来并成为这一运动的支持者，相反，对于沿海及少数城市出现的这些新东西更多的倒是采取了敌视、排斥和毁而弃之的态度。农民运动的主要目标，同他们的先辈一样，还是通过土地与财富的重新分配，使他们小生产的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的经济结构以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继续保持下去。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义和团运动失败了，

辛亥革命前后许多农民暴动也失败了，但是，农民运动并非没有结果。1850年全国总人口近4·3亿人，1910年下降为近3·68亿人。农民运动最发展的各省，人口数下降最明显：同一时间，江苏由4400多万人下降为2588万人，安徽由3760万人下降为1623万人，浙江由3000万人下降为1800万人，湖北由3374万人下降为2765万人，江西由2450万人下降为1698万人，山东由3310万人下降为2956万人，山西由1510万人下降为1010万人。而耕地面积在此期间由7亿亩增至14亿亩以上。人口过度膨胀与土地过分集中这两大危机都有所缓和，农民的小生产与自然经济结构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与有限的复苏。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失败后，江淮以南广大地区农民运动沉寂了几乎半个世纪，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北方农民运动也沉寂了近三十年，这恐怕正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一场新的大规模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和近代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相比，当然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人们在强调这场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的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时，常常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它的主要基地正是受近代化现代化影响最少的落后的内地农村，它的主要斗争目标仍然是平分土地，确保他们的小生产与自然经济下传统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1930年5月毛泽东所作的寻乌调查，是他二、三十年代所作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查，结果，他发现寻乌这个位于东江上游、赣闽粤三省交会之处，南北交通还算发达的城市，竟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2700人中农民占60%，手工业者占11%，游民占10%，商人只占5%，较娼妓所占比重还少1%。所谓商人，也就是盐行、杂货

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货店、药材店的老板。这个统计数字非常典型，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赣南、闽西、湘鄂、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川陕、陕北等根据地之所以得以在这些地区建立，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大体上正处于寻乌这种发展水准，甚至还落后于这一水准。由于有了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些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同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但是，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减税，耕者有其田，如是等等实际的社会变动，与近代化现代化进程并无直接联系，即与现代商品经济及社会化大生产并无直接联系。红色根据地内经过接人口或按劳力平分土地之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减租减息之后，解放区内土地改革之后，自然经济结构不是瓦解而是得到恢复与发展，小生产不是削弱而是加强，都表明农村的实际变动基本上还是从属于中国小农社会等贵贱、均贫富及均田免赋一类要求所体现的周期性运动。

在许多西方国家，农民挣脱农奴制的桎梏而成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小农，是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殖民扩张以及农民自己转变为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小农确实每日每时不断地自发产生着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近代化现代化得以成功的重要支柱。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小农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时就已出现。他们与西方那些小农不同。他们以一家一户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但不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依靠有限的劳动力与小块土地的紧密结合，农业与手工业在家庭范围内的紧密结合，为满足自己家庭的繁衍生息的需要而生产。财富取决于家庭中有多少劳动力和耕耘多少土地，为增加财富，就必须不断增

加家庭的人口，增加家庭所占有的土地，这就导致人口不断膨胀和土地兼并。为了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抵御周边游牧民族入侵，维系小农生产所希求的稳定秩序，他们提供赋税、劳役、兵源给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这种国家权力由于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谋取特殊利益的方便工具，不可避免地就要使自身的机构不断膨胀，使权力追逐者与分享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对特殊利益的追求不可遏止地不断增加，终于成为小农经济不可承受的负担。土地由分散而集中，人口由稀少而稠密，负担由轻而重，小农经济体制的运行于是出现了周期性的周而复始运动的特征。当土地有限的生产力同庞大的人口、剥削者的无限诛求构成的沉重负荷之间的均衡再也维持不下去之时，农民们无法生存下去，就会揭竿而起，通过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农民战争，通过各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的自流性的冲突、肆虐，打破原先的矛盾胶结状态，使庞大而腐败的官僚机构和集大量土地与地租于一身的大地主、大恶霸被扫荡，使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游离于土地之外的大量过剩人口得以重新附着于土地。生产农民们朴素的直接要求就是反对贪官污吏、地主恶霸，反对横征暴敛、重租盘剥，实现减租免赋、平分土地。大乱之后的大治，不是建立新的生产方式，而是重建小农社会原来的秩序。中国这种小农，每日每时不断自发产生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他们不但不是资本主义近代化现代化得以成功的支柱，而正是阻遏这一进程的巨大而牢固的屏障。正因为如此，在考察近代以来以土地平分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与农民战争时，就不应当不顾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特征，套用西方一些国家的模式，把平分土地的

运动同近代化现代化的要求简单化地混合为同一方向同一性质的运动。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必须敢于正视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的不同性质、不同方向。

中国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先行运动。它的基本任务，就是使全体国民从传统的小农文明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现代文明品格与素养的人。陈独秀《敬告青年》中提出人当自觉，使自己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人，其后，他又一再呼吁从以安息为本位进到以竞争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进到以个人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进到以法治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进到以实利为本位，等等，大体上表明了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现代文明素质的人同小农文明素质的人根本区别之所在。和维护传统的小农文明的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相遭遇时，启蒙运动自然就会发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掠夺、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方面，他们确实是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在变小生产为大生产、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变小农文明为现代文明方面，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实践却大相径庭。启蒙运动所希望改变的，却往往正是农民运动所坚持的；启蒙运动所希望达到的，却往往正是农民运动所希望去除的。启蒙运动与农民运动之间这种既联盟又对峙的复杂关系，便引发了它们两者之间既相拮抗又相渗透的特种对流运动。

二

启蒙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影响本是相互作用的。然而,后来竟至于个人迷信、中世纪式的偶像崇拜压倒科学思维,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横暴压倒法制与民主,小生产基础上的平均主义与自然经济压倒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及科学管理,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充满野性、盲目的、放纵的破坏性质的旧剧。启蒙运动的力量与作用哪里去了呢?它为什么没有能发挥它应有的影响以防止这样的旧剧重演呢?这就有必要具体地探究一下启蒙运动与农民运动彼此对流的实际情形。

中国启蒙运动与农民运动相比,规模远远不及,根柢远远不及,力量更远远不及。启蒙运动内部,由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自身的多元性,取向不一,行为方式不一,互相抵制,互相消耗,使它便变得更加脆弱。结果,当启蒙运动与农民运动互相对流时,后者的流量与冲力便自然地会压倒前者。

不仅如此。物理学中所考察的对流,有自然对流,也有强迫对流。如果说,上述两种运动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在对流中必然会使力量较强的一侧占居较大的优势,属于自然对流,那么,人为地强化农民运动的冲击力,而抑制启蒙运动的作用,所造成的结果则应属于强迫对流。

近代以来,致力于政治社会变革并以此为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先导的许多革命家,都注意到了农民运动这一股可能释放出巨大能量的社会力量的重要地位。他们试图吸引农民运动

到自己麾下，也确实取得一些成效，但是，最终还是发现，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农民及农民运动引入近代化现代化通途。新文化运动中对国民性坦诚犀利的自我反省，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传统的小农文明的反省，就是对占人口大多数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精神素质的反省。《阿Q正传》通过阿Q这样一个给人打短工的雇农形象，具体地展示了传统的小农文明如何使人们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如何使人们为不开化的利己性所驱策，沉溺于停滞苟安失去尊严的生活而不自觉，如何使人们对严酷的现实苦难漠然视之而凭藉麻木不仁的精神上的自我慰藉、自我满足而求得解脱，如何使人们的造反、革命只限于革去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以及把财主们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牙床、桌椅搬进自己所住的破土谷祠。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呐喊，正是要引导人们真正超越小农文明而成为现代化的人。他们承认农民是冲击旧秩序的造反者，但也深知，不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特别是亿万农民的现代化，旧的秩序还将经过这些造反者之手重建起来。鲁迅呐喊最力，正因为他对于这一点感受最深。

然而，在俄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决策的直接影响下，中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条与这一认识相异甚至相背的策略路线，这就是以农民为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通过一场现代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达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统治、反对地主阶级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目标。这一条策略路线同启蒙运动的原则分歧在哪里？谭平山1926年12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代表共产国际中国委

员会所作的报告曾说道：“中国无产阶级面临着重大的任务，即选择同盟的问题：是农民还是资产阶级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很清楚，这个同盟者应该是农民。”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但这一段话确实道出了问题的症结。从《共产党宣言》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直强调，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农民为维护自己的生存以免于灭亡而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甚至力图使历史车轮倒转，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只有当他们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即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时，他们方才 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农民等中间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启蒙运动可以说大体上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这一立场。他们并不蔑视农民，但深知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革命意义，启蒙的根本任务正是要把农民从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引导到创造现代大工业所代表的新生产方式基础上来。他们承认在反对封建主和旧生产方式的历史大变动中，资产阶级仍然是革命阶级。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观点与此不同。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的言论，这一观点实际上包含着以下这样几层意思：农民天然 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而且是最彻底一贯的联盟军；贫农、雇农是最彻底革命的分子，是革命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与生计问题的民主主义要求可以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求结合起来；中国革命家